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馬來亞共產黨史的生產與問題

doi:10.30135/RTR.201207.0012

人間思想, (1), 2012

作者/Author：潘婉明

頁數/Page：155-16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135/RTR.201207.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馬來亞共產黨史的生產與問題

自1930年建黨算起，加上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探索階段及「南洋共產黨臨時委員會」(The 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ttee, 簡稱「南洋臨委」)的草創時期，馬來亞共產黨至少有九十年的歷史可書。但截至2012年為止，馬共尚未有黨史問世。究其原因，一曰沒有取得政權，二曰沒有共識。

這是事實，只是過於簡化。沒有執政無礙於歷史總結，馬共解除武裝已歷二十餘年，應該有足夠的時間盤點其歷史，卻沒有達成，想必有道不出的隱衷；沒有共識才是正解，但也不能就此稀釋化約了其中的歧異。一般認為，「肅反」和「分裂」是馬共鬥爭史上最大的爭議，兩造若不願鬆口或退一步促成和解，在取得歷史的默契和共識之前，任何黨史的產生，都不可能獲得雙方共同承認。此話不假，「肅反」和「分裂」確實是馬共歷史總結的罩門，但我認為，馬共黨史的延宕，有比這一點更複雜更糾結的因素，也有比分裂兩方更多方的歧見。

馬共無黨史，但並非無史。馬共在其各個歷史階段，都曾經就黨的成立及其進程做出交待。早年或限於條件，相關文獻的內容極簡，篇幅也不長，但可見出馬共重視歷史的態度，有其傳統。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們近幾年彙編史料的努力和出版文獻的數量得到證實。下文將以介紹幾份堪可代表黨史的重要文件／獻的內容與性質開頭，繼而討論馬共黨史生產的困境及其思維的陷阱，冀能藉此進一步說明這場鬥爭的成分紛雜，任何一方存有偏見，都會妨礙它的整合，使彼此互看不見。

一、史前史：類黨史的重要文件

馬來亞共產黨的歷史現場不限於一時一地。因此馬共黨史遲遲未能修訖，跟它的時間、疆域跨度太大，導致世代脫節、彼此互看不見有關。¹ 但就我的理解，馬共並不是一直處於無史的狀態。早在1946年1月，距日本投降尚不足半年，馬共就出版了言論集《南島之春》，裡面收錄的〈馬來亞共產黨史略〉（以下簡稱〈史略〉），估計是馬共對外公開的第一篇黨史。它是一篇名副其實的「史略」，篇幅簡短，不足7頁，僅交待馬共成立的大略、戰前的國際形勢，以及幾次代表大會的綱領和目標。² 該〈史略〉自1925年說起，至1946年剛滿二十年。對於一個尚在摸索、又經歷戰事的黨而言，二十年的時間或夠不上一篇滿載功業的黨史，但作為最早出版的類黨史文獻，〈史略〉的內容稍嫌薄弱，乏善可陳。

馬共的第二篇黨史很可能是1962年由中央委員陳田所撰的一篇未命名的文件。1960年底，為尋求中共支持其撤兵計畫，馬共中央決定調派陳平、李安東及陳田三人北上中國。³ 初到北京，陳田即著手整理資料，以「庄聲」之名撰寫黨史，並於1962年5月25日完成手稿，內容包括了馬共自創立以來到1959年的發展。陳田當時可能沒有意料到，他此去不再復返，但在他流亡中國的後半生歲月裡，一直到1990年去世為止，都沒有再續寫下去。因此這份文件一直停留在「手稿」的狀態，且沒有定題，直到它被收錄在《陳田紀念文集》，才由編者題名為〈馬來亞共產黨史料〉（以下簡稱〈史料〉）。⁴

〈史料〉的內容主要以大事紀的形式安排，按時序陳述，尤其著重歷次中央擴大會議及其他各次重大會議的召開，並一一記錄每次會議通過的決議、

- 1 相關的討論詳見：潘婉明(2011)〈在地·跨境·身體移動·知識傳播：馬來亞共產黨史的再思考〉，《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3卷第2期，頁57-71。
- 2 〈馬來亞共產黨史略〉，《南島之春》，新加坡：馬來亞出版社，1946，頁8-14。
- 3 陳平(2004)《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頁368-370。
- 4 陳田(2008)〈馬來亞共產黨史料(1930-1962)〉，收於林雁、賀巾、文羽山編撰(2008)《陳田紀念文集》，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頁82-138。

綱領、主張、宣言、任務、決定或意見，中間也安插他對那些影響馬共決策和方針的國際動向所作的分析。陳田的敘述相當有條理，思想正統。〈史料〉從馬來亞遭受殖民談起，開宗明義指馬共的誕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陳田把馬共鬥爭放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來理解，因此全文諸多針對黨的錯誤所進行的檢討，最後都歸結出「對馬列主義的鬥爭策略掌握不夠」、「對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夠」的結論。整體而言，陳田的文字清晰、心思縝密、論述端正，但也可見出他的個性略帶保守、注重瑣屑。〈史料〉雖然在措詞方面頗為含蓄、內斂，卻不失坦率。陳田雖對馬共在一九五〇年代初露敗象的記述跳躍得很快，但他沒有迴避，坦承投敵者眾，「處境空前困難」，以致「現在，除了小股隊伍活動之外，中、南馬一帶的部隊可以說已經崩潰了」。⁵

陳田之後，馬共最重要的黨史文獻當數總書記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距那份未命名的「手稿」四十年後，陳平回憶錄的英文版(*My Side of History*)首先在2003年出版，次年翻譯成中文，備受矚目。《我方的歷史》雖然以回憶錄形式成書，但它既是「最高領導」的現身說法，即被各界視為某種權威的代言，可用以檢驗馬共的歷史。陳平似乎也有意扮演這種角色，因為他要說的是「我方」的歷史而非「我的」。

然而，當陳平試圖用全視的角度敘述他未參與的情節，「我方」和「我」之間不自覺地出現了角力和推卸。細讀文本，我們大致可以將《我方的歷史》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自我背景介紹，說明他個人的成長及其走向共產主義的經過。此占篇幅極短，約20頁；其次是他在馬來亞參加革命期間(1940至1961年)的種種，依順序敘述：加入馬共、參與抗日、地下活動、游擊戰鬥、負責一三六聯繫、退伍復員、黨內鬥爭、追查叛徒、發動武裝、建立根據地失利、新村打擊、伏擊欽差、撤退邊區、華玲會談、遣散部隊、北撤中國等等。這其中有許多事他都沒有親歷其境，但他對自己赴華之前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都一一交待兼評論，包括在和豐(Sungai Siput)擊斃英籍園丘經

5 同前引，頁136-137。

理、攻占話望生(Gua Musang)警察局宣布建立解放區、英軍濫殺峇冬加里(Batang Kali)平民事件、李明逃過死刑的傳奇等等。這個部分的篇幅極長，共三百餘頁；最後是他流亡中國期間(1962至1989年)的種種及和平協議的簽訂，內容包含馬共政策由「偃旗息鼓」轉變為「新方針」的經過、在湖南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兩次肅反引起的中央分裂、「革命之聲」停播後由泰南發送的「民主之聲」替代、合艾和平協議的催生與實現、解除武裝後的人員安排與安置等等。這個部分的篇幅中等，唯不足百頁。

以上分析說明，陳平回憶錄的這三大部分明顯比例不均。他以3/5強的篇幅敘述21年的經歷，卻以不足1/5的篇幅交待另外27年的歷史。他做這樣的分配並不令人意外，大致可理解為他長年駐外，既未掌控部隊也未大權在握，而馬共的鬥爭在中後期也無大作為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陳平的敘事都不斷地在「我方」與「我」之間的發生角色跳躍。《我方的歷史》前面的部分，陳平習慣用「我的」來說明他的地位及展現他的信心，如我的軍隊(my army)、我的人馬(my man)、我的司令員(my military commander)、我的政治事務官(my political affairs officer)、我的副手(my deputy)，甚至是我的游擊隊(my guerrillas)。可是越到後面，特別是在華期間，他越多使用「我們」，越發加深他代表「我方」發言的意味，雖然在語氣上逐漸顯得氣弱。但每當檢討過去馬共鬥爭所犯下的各種錯誤時，他又開始將「我」與其他「大多數意見」(majority opinion)進行切割，稱異於「我」的其他人為「他們」。在黨的重大決策上，陳平甚至多次表示「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I fell in line)、「我保持中立」(I took a neutral stand/ I remained neutral)或「我無能為力」(nothing I could do)。⁶

縱觀《我方的歷史》全文，陳平的敘事中有一貫的「我」，卻沒有一致的「我方」。「我」在知情的範圍內總是洋溢著熱情與自信、年輕而堅定、在摸索中行動、敢於提出批判、適時承擔責任，也有勇於承認失誤的一面。然而

6 Chin, Peng (2003)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pp. 9, 19, 72, 108, 433, 444, 466, 474.

「我方」卻不是一個集體，而是視戰略的對錯、決策的成敗、責任或責難的輕重等後見之明，由「我」、「我們」或「他們」自由重組。「我」與「我方」的交錯與跳躍，固然出於陳平對個人隱私和馬共歷史有所掩飾，但究其原因，乃因為總書記不在場之故。換句話說，這是讓缺席者來填寫歷史現場的結果。事實上，《我方的歷史》作為類黨史文獻的有效性及意義不大，因為傳記本來就是承載個人意志的文體。但《我方的歷史》因以英文出版，成為西方世界能閱讀的少數馬共文本之一，遂令它比其他馬共文獻擔當了更多的關注和批評。

和平協議簽訂距今已逾二十年，馬共黨史的生產確有延宕，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於本黨歷史的保存不感焦慮。馬共的出版機構21世紀出版社（簡介詳後）自成立以來，積極編纂各類系列叢書，試圖透過自我發聲來抗衡殖民者及國家長久以來的片面詮釋。2010年始，馬共陸續推出的《馬共文集》系列，將黨史各個階段的文件依分期⁷彙編成冊，其中包括馬共最早的出版品《南島之春》內的各篇章、黨的章程、各次擴大會議的決議、鬥爭綱領、主張、通告、廣播稿、學習材料等等。

《馬共文集》的安排非常紊亂，它並不是純粹的文獻彙編，當中有許多內容是資料搜索和剪裁的結果，各輯中還附錄了相當篇幅的學者論文。我們不難理解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多年的戰鬥和流徙想必造成文獻散佚，而保存下來的也未必集中一處。編者坦言，《馬共文集》的整理和編輯工作並不簡單，「不是『有求必應』、垂手可得的」。⁸總的來說，這些文獻的集結距類黨史的性質甚遠，但它們卻是未來黨史生產過程中至為重要的參考及引用材料。無序何嘗不是一種秩序，紊亂有時比井然能透露更多訊息，研讀它們的意義正在於此。

7 根據黨的活動歷史，馬共將黨史分為六個時期：戰前地下鬥爭時期（1930年4月至1941年12月）；抗日戰爭時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戰後和平時期（1945年8月至1948年6月）；抗英民族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6月至1957年8月）；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57年9月至1989年12月）；和平民主鬥爭時期（1989年12月至今）。

8 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2010）《戰前地下鬥爭時期（一）：建黨初期階段》，吉隆坡：21世紀，頁iii。

無論如何，馬共至今未有黨史是很明白的事實。黨史編修的耽擱並非偶然，表面理由不外乎意見分歧沒有共識，但箇中的複雜有可能超出想像。由於馬共的鬥爭歷時過久、戰線過長，牽涉到的地理、人物和陣營極多，加上「前線」與「後方」相隔過遠（且「後方」不只一個），戰鬥和政治不能同步也互不協調，彼此鞭長莫及；而各地崛起的地下勢力在不同階段摻揉進來的奧援與介入，令馬共作為一個整體的面貌更難辯識，其中的糾結亦更難以拆解。因此，我們必須借用其他框架來認識馬共，而通過對馬共／左翼⁹出版機構及其出版品的分析，或有助於我們理解黨史生產困境背後的障礙及其共同的思維局限。

二、黨史生產的困境及問題

晚近十年，以中文為媒介的馬共／左翼出版品似有「大量出土」的現象。一般認為，這是馬來西亞政治小開放的結果。無可否認，就數量言，確實有持續且迅速增長之勢；就市場的銷路言，也充分反映出老左們的熱情，而這種情形一時還不會改變。但這無疑也是危機所在：「大量出土」的文獻僅可「內銷」，因此很可以預見，這不是一個拓展而是正在萎縮的市場。不過，馬共在出版方面的表現仍然積極，多年探索的經驗，也讓他們越發自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兩年，他們對文獻的出版及其論述的生產，越是得心應手，就越欠缺思慮。下面將簡單介紹各個參與馬共／左翼文獻出版的機

9 在此特別突出左翼，是為了區隔，也避免化約。馬共固然是一個明確的政黨或政治身分，但它卻不是一個固定、不移動的概念。在很多情況下，它可能已轉變為一個信念、一種認同，甚至只是一份鄉愁。舉例而言，一名被驅逐出境的馬共黨員，回到中國後入籍當地，其後申請入（中國共產）黨，但當他受訪時，卻仍以馬共的立場發言；另一名被驅逐出境者，初在中國落戶，後輾轉到了香港，持英國護照，卻堅稱馬來亞是他的祖國；還有眾多因參與學運、工運而身繫過牢獄的人，雖和馬共地下成員的「同學們」過從甚密，但堅持自己本身不是馬共；而有一些人自稱馬共，卻未必受承認。馬共和「老左」之間有很微妙的界線，為慎重起見，故以左翼來放大其框架。

構，再概括地討論其出版品的問題及思維的局限。

馬共不能代表整個左派陣營，而左翼當然不僅止於馬共。縱觀現有出版左翼刊物的出版機構，即可很好地說明左派並不是一張完整的版圖。這幾年，馬共／左翼出版品充斥書肆，這種活絡的情形大致由以下幾個出版機構共同促成：

21世紀出版社：1989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訂和平協議後，約有四百名具有馬來(西)亞國籍的馬共成員申請回國定居。最初十年，他們奔波生計，散布在全馬，長時間沒有組織性的聯繫，直到千禧年(2000/2001年)交接之際，才倡議成立「21世紀聯誼會」，後亦在此會名譽下組成出版社。21世紀出版社據稱由馬共基金注資，由聯誼會的核心幹部為編輯，其立場亦代表著以北馬局／陳平為首的馬共中央的「主流」及「正統」。他們有一系列的出版計畫，有其時間表及議程，按照既定的框架詮釋這場革命鬥爭史。

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er, SIRD)：SIRD是目前出版左翼文獻最正規也最具規模的出版機構，從一九九〇年代末開始就一直是國內出版左派／另類書籍的重要管道，包括中英文的著作。其負責人具有左派背景，是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政治扣留犯。他是少數能結合／跨越新馬不同教育源流／各族左翼陣營的文化事業工作者，同時也是分布在各地區新馬左翼人士的橋樑。

香港：一九九〇年代，居港的新馬人士分別成立了**南島出版社**和**見證出版社**。兩者的性質不同，**南島**是由馬共成員自己組成，著重整理和收集史料；而**見證**的編委由居港的新馬人士組成，不一定具有馬共身分，他們整理、彙編、出版相關歷史文獻，但不做評述，讓材料自己說話。2007年**見證**社長病故，其「一人註冊」之出版社亦隨之終結，有志者隨即另行註冊**足印出版社**，繼續其他出版計畫。**見證／足印**的立場和角度開放性較高，預設較少。其主事者以歷史為使命，鼓勵當事人撰寫個人回憶，也不遺餘力地收集人名錄，盡可能為每一位參與過這場抗日／反殖的、被驅逐的革命者留下一筆紀錄。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輾轉來港的原新馬人士，由於長期脫離在地的戰

鬥，在中國的境遇也各不相同(由於有華僑背景，許多人在文革時期及其他政治運動中因「海外關係」而遭遇到各種苦難)，他們的立場和看待問題的視角很不同於直接投入戰場的本土戰士，當然內部差異也非常大。他們對邊區的戰鬥和決策有所質疑，對一九六〇年代末部隊裡發生的肅反事件特別敏感，對馬共分裂和「馬來西亞共產黨」(簡稱「馬西共」)的成立多有同情，祈翼歷史能作出公正的交待。

朝花企業出版社(Wasasa Enterprise)：因不滿於國家任意裁剪編纂其「獨立建國史」的版本，一批左翼人士乃於1996年杪組成「**歷史的另一面**」編輯委員會，希望透過出版一系列的叢書，對既有的論述做出糾正和補充。但由於人事複雜，結構鬆散，因而沒有常態運作，出版量也低落。

個人出版：以個人名譽出版的文獻，背後經常有一段不好說穿的故事，可能純粹是出於人際網絡的欠缺，也可能因不符合任何一家出版社對左翼論述／大歷史敘事的期待(如公開為愛情革命的女性敘事)，或與其立場和立論有所抵觸(如被定性為「投降派」的傳記、家屬追究肅反冤案的訴求、要求平反「馬西共」之「叛黨」爭議等等)。零星出現的個人出版，最能反映左翼派系與人際關係的複雜性，以及這場鬥爭中最難解的歷史糾結。

由上述出版機構及個人累積的成果，數量可觀。仔細研讀這些文本，不難發現它們在一個可允許的範圍內相互駁斥、暗中較勁的有趣現象。我樂見這種歧異，它代表多元，同時也是一種內部的對話。非主流也有其「主流論述」，作為更邊緣者觀照的「中心」。因此，當更邊緣者對某一「主流」提出控訴時，對話甚至對抗便可望達成。換句話說，當各陣營紛紛出版形式和格局雷同的文獻來抗頡以正統自居的馬共中央派，儘管它們都非常一致地呈現了論述破碎、文采無華的共同性，也無損其文獻價值。而更令我動容的是，即使它們當中許多是思路紊亂、時序斷裂、敘事跳躍、記憶定格的短篇，事實上那都是凝聚了某個人的青春和生命所譜寫成的。

總的來說，通過出版的形式，不同立場和地域的馬共／左翼人士已經形成一個廣義上的大左派陣營，也在一定程度上攻占了長期被官方或主流壟斷的發言位置。左翼在新馬並不算是一個小的社群，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曾掀起

一場驚天動地的鬥爭，但老左們卻沒有整合成一個有力的整體。¹⁰而他們所生產的文本，本身也陷入論述的危機和困境。關於誰是／不是馬共的命題，背後有極嚴重的思維盲點，茲討論如下：

馬共作家賀巾的小說《巨浪》¹¹記錄著新加坡學運最重要的一頁：「五一三事件」。1954年，殖民政府頒布「國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Act)，規定在馬來亞及新加坡出生的十八到二十歲男性需登記入伍。此舉引起華社反彈，華校生(特別是超齡生)遂於5月13日前往總督府請願要求免役，結果與警方暴發衝突，造成48名學生被捕，約50至60人受傷。是夜，超過千名學生集合在中正中學，抗議政府對學生施暴，後經中華總商會協調，學生獲釋，而總商會也限於壓力，宣布提前放假以解散學生。6月2日，學生伺機重返校園展開另一波集中，整場反對運動持續到6月24日，教育部恫言關閉學校才落幕。¹²賀巾是「五一三」的當事人，也是學生領袖之一，他的小說內容寫實，比其他零散的材料，更詳細地記述了當時的事發經過、同學們的遭遇和感受，以及後續校園集中的概況。小說清楚地交待了這場學生運動的主體是學生，他們之中縱有馬共的地下成員，但整起事件並不是由共產黨主導的。作者身為黨員，乃以學生身分參與其事，因未向上級報告，事後還受到訓斥。對當年參加集中的學生而言，「五一三事件」的主體誰屬是一個絕不能妥協的問題。他們投身學運出於自發，對此也深感自豪，但他們都不是馬共，

10 目前活躍於馬來西亞的左翼社團有三：其一是由返馬馬共所組成的「21世紀聯誼會」，其會員的界線清楚，這也意味著它是一個必然萎縮的團體；其二是廣納全國老左，尤其是曾在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下被逮捕的政治扣留犯而組成的「老友聯誼會」；其三是由一九六〇年代輝煌一時的勞工黨黨員所組織的「鳳凰友好聯誼會」。後二者的會員多有重疊，動員能力亦不容小覷。

11 賀巾(2004)《巨浪》，吉隆坡：朝花。英譯版：He Jin (2011) translated by Tan Jing Quee etc., *The Mighty Wave*, Petaling Jaya: SIRD.

12 陳仁貴、陳國相、孔莉莎編(2011)《情繫五一三：一九五〇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吉隆坡：資訊策略研究中心。Tan Jing Quee etc. (Eds.) (2011) *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 Petaling Jaya: SIRD.

airiti

也沒有接受馬共的領導。那些具有馬共身分的當事人，大致上也不否認這點。¹³

不過學者孔莉莎(Hong Lysa)卻注意到，這樣的敘事正好體現了政府的邏輯：馬共即「非法」。「五一三事件」是新加坡學生運動乃至於整個一九五〇年代左翼力量崛起的肇始，它在反殖建國的歷史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五一三事件」也是左派人士最後的精神堡壘，他們必須「保全」它免受共產黨的「汙染」，因為唯有否決馬共的存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五一三事件」才得以被納入「合法」的建國運動史。然而當左派為了聲張其「合法」而與馬共切割時，他們就已經接收了官方的思維與論述。

在同樣的主張下，「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馬共」變成大家最在意的問題，也經常在學術研討會的場合被提出來。林清祥是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深具個人魅力的政治領袖，擁有強大的群眾基礎，是李光耀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最具威脅的對手。他在從政期間多次繫獄，終致精神崩潰，釋放後被迫流亡英國。林清祥在1996年辭世，但他至今依舊活在左派朋友們的心裡。基於「愛護」他的緣故，大家幾乎眾口一詞「替他」否認為馬共的身分。一般指稱，林清祥是「抗英同盟」的盟員，他自己本人也承認。但這個身分並不能直接等同於馬共。¹⁴論者也指出，沒有任何學術的成果或檔案的證據可以坐實這項指控。¹⁵

13 潘婉明訪問，謝炎輝口述，2010年12月29日，香港天水圍；潘婉明訪問，鄭有領口述，2010年12月29日，香港天水圍；潘婉明訪問，林金泉(賀巾)口述，2011年7月19日，泰國曼谷。

14 「抗英同盟」吸收盟員有一定的程序：首先給對方看文字材料，如《自由報》或介紹革命的文學，使之成為「讀者」；經過觀察的「讀者」以執行簡單的任務作為考驗，如派傳單、貼標語或沒收身分證，通過者將被接受為盟員；盟員之中，表現好、覺悟高者，將可提拔為黨的同情者，而後晉升為候補／預備黨員，最後才轉正為正式黨員。由於這個程序步驟太多、耗時太久、要求太高，很不利於運動，因此自1957年始馬共就停止在新加坡發展新成員。見：張泰永口述，2010年12月30日，中國廣東省深圳；謝炎輝口述，2010年12月29日，香港天水圍。

15 相關資料見：Tan Jing Quee, Jomo K. S. (Eds.) (2001)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不過，馬共方面大唱反調，強烈暗示林清祥是黨員。馬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黨員身分的認定在於他堅決反殖與否，「是不是有『入黨證據』並不重要」。因此，在那段尖銳的時刻，馬共「總結和制訂了一系列地下工作、鍛鍊幹部和吸收黨員的保密制度和組織措施」，為的就是嚴防在發生差錯時，「公開活動的領袖人物有『非法身分』的物證落入敵手」，而文中所指的「公開活動的領袖人物」正是林清祥。¹⁶

「五一三的主體」和「林清祥是不是馬共」的辯證為什麼重要？在田野裡，這兩個問題持續地發酵：事緣一批在新加坡地下及流亡印尼期間追隨過「學委」詹忠謙的黨員，近日在香港／大陸等地醞釀著替上級平反的出版計畫。他們指「五一三事件」乃由詹所領導，又稱詹的領導地位猶如「地下的林清祥」。上述出版雖尚未付梓，但其中幾篇文章已在新加坡左派之間流傳開來，引起華校生極度不滿，並針對相關內容展開抗辯。不過很有趣的是，馬共也參與其中。華校生求證於馬共，以便那些兼有學生和馬共雙重身分的當事人來否決詹的角色，同時也杜絕詹的追隨者藉「五一三」話題被重提之際，趁機「邀功」。從這裡我們認識到：任何「玷汙」了「五一三」的主體或「牽拖」林清祥為馬共的言論，都不為華校生所容；而這整個爭辯的過程，也可以視為印尼流亡隊伍權力鬥爭的延續。¹⁷

但更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捍衛」背後的邏輯。當「五一三」學運不是由馬共主導，其貢獻才有正當性；或當林清祥不是馬共，他的冤獄才構成政治迫害時，那麼大左派陣營非但沒有超脫官方建構的論述，反而認同了「馬共＝非法」的思維。這個集體的盲點¹⁸讓左派陷入兩難：當馬共／左翼都在尋求

History, Kuala Lumpur: INSAN.

16 葉敬林(2008)〈淺評李光耀(上)〉，《深埋心中的秘密：新加坡與檳榔嶼的故事》，吉隆坡：21世紀，頁120-121。

17 小說《流亡》對在印尼流亡期間發生的整風運動有相當詳實的描寫。雖然是小說體，卻是目前對這段歷史最為具體的記述。見：賀巾(2011)《流亡：六十年代新加坡青年學生流亡印尼的故事》，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18 田野裡有人認為，這是左派人士「看風使舵」之舉，以開脫林清祥來撇清自己，辜負了這

airiti

國家承認其抗日、反殖、建國貢獻之際，他們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生產的文獻中所出現的「馬共=非法」的論述？

更複雜的是，誰是或誰不是馬共的爭議，不僅止於論述的層面，還包括在現實中的操作。前面提到，馬共的歷史現場不限於一時一地，馬共的戰鬥歷時過久（長達四十一年），其戰線跨越了過多的區域（計有：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南、印尼、港澳、中國），而且經歷了政權更迭和世代變換（如：從抗日到反殖到獨立、從公開到游擊到地下到流亡、從1954年新加坡的「五一三」到1969年馬來西亞的「五一三」¹⁹等等），導致他們對本身歷史的整體認識不足，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換句話說，他們同是馬共，卻互看不見。

根據馬共的正統論述，獨立以來到和平協議簽訂的32年（1957年8月至1989年12日）被劃為「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分期，如此才能合理化馬共在國家獨立後仍持續戰鬥的決策。然而兩位前線戰士的口述歷史卻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聲稱馬共的鬥爭已經失敗，一旦國家獨立了，馬共就沒有再鬥爭下去的理由。這兩位前馬共戰士是當年未及北撤泰南而困守在柔甲（Johor-Melaka）山區的游擊隊員，他們從一支百人的隊伍戰至最後幾人，堅持到獨立前夕的才繳械投誠，接受特赦。他們其中一位是資歷很深的馬共黨員，曾在日軍入侵前夕奉派到新加坡接受「101特別訓練學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的抗日培訓。²⁰然而像這樣為馬共苦戰多年的倖存者所下的結論，卻不算數。

場左翼鬥爭的歷史，頗有令人看不起之處。但我認為這可能只是一個歷史的詭譎、集體的盲點，因為左翼陣營從來不是一個整體，也從來沒有產生過甚麼共識。

- 19 馬來西亞的「五一三事件」指1969年大選後發生的族群暴動。一直到今天，該事件在馬來西亞仍是政治禁忌，比馬共／左翼歷史的課題更為敏感，同時也導致華人社群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對政治產生集體的畏懼和冷漠。
- 20 胡山（2008）〈昂首朝天心無愧〉，《古城硝烟》，香港：足印，頁3-24；薛河清（2011）〈金山嶺下的抗英歲月〉，《金山嶺下的抗英歲月》，香港：足印，頁9-53；潘婉明訪問，薛河清口述，2010年4月22日，新加坡金文泰；潘婉明訪問，胡山口述，2010年8月30日，馬來西亞霹靂州叻思。

這種完全背離正統論述的主張固然不能見容於馬共，許多沒能堅持戰鬥到底的人，其馬共身分也不被承認。在文獻和田野裡，我們能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馬共，有長期在馬境內戰鬥的突擊隊員、有自邊區返馬的戰士、有被驅逐出境的抗日分子和反殖鬥士、有潛伏在印尼的流亡隊伍，也有被迫在新加坡簽署政治聲明的地下成員，不一而足。我曾在一篇投稿指出，其實馬共生活在我們周遭，文中提到悔在森林當了九年「憨仔」的垂死老人、變成富豪的福態商人和虔心信佛的投誠者等等，²¹ 結果在田野裡被一名資深馬共戰士當面指正，謂這些人「曾經是馬共，但不是馬共」。此事促使我進一步思考：如何才能「一直是馬共」？這無疑是要靠運氣的。事實上，每一名被逮捕、被俘虜、被驅逐的馬共，背後都有一個出賣他的「叛徒」。²² 如果因為沒有走到1989年「光榮和解」這一步就變成「不是馬共」，那麼我們將很難理解這場歷時四十年的戰鬥中途發生的所有變故。如果「一直是馬共」才是馬共，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在被國家刪除復又被內部排除的情況下釐清這段鬥爭史的複雜性。

各地的田野、各種立場的論述不斷地警示我：馬共並不是一個馬共。這段歷史牽涉太多人事，所有被捲入這場鬥爭，為這場鬥爭付出過青春或性命者，都必須被提及，都必須被承認，即使他們沒有堅持到最後，也不應該被排除。在大時代的歷史十字路口上，去留的抉擇不一定是「堅貞」或「背叛」這樣二元對立的概念可以充分說明的。再說，縱使是變節也是這段歷史的組成部分，唯有盡可能納入更多的情節，我們才能拼湊出相對完整的圖像。

三、小結：馬共歷史的生產、論述與總結

長時間浸泡在田野，讓我的「閱讀」挾帶了田野的「觀察」所得。我對編

21 潘婉明(2008年4月23日)〈解構新村共同體，尋訪馬共的身影〉，《獨立新聞在線》，<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6570.html>。

22 《新馬歸僑抗日抗英人名錄》兩冊收錄了超過600名被驅逐者的背景簡歷，儼然就是一部叛徒出賣情節大全。詳見：廣州新馬僑友會等編(2009)《新馬歸僑抗日抗英人名錄》，香港：足印；廣州新馬僑友會等編(2011)《新馬歸僑抗日抗英人名錄(續集)》，香港：足印。

書的背景越了解，對書成的面貌就越理解／諒解，但同時也對文本產生更多揣測、不安和不信任。出於自我保護及貫徹「政治正確」的原則，馬共對歷史進行了不少修飾和編輯，輕則裁剪照片技術犯規，重則排除異見封殺不同立場的論述。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些文獻的出版彰顯的不是「歷史知識生產」的力量而是「生產歷史」的過程。

整體而言，馬共／左翼文獻本身的論述性也不夠強，作為對照和解析現象的意義更甚於論述及對話的功能。它們經常以文獻彙編為目的，而且也有政治口號化和標準化的問題。這樣的文獻雖以抗衡為目的，但它們自身並不能產生抗衡的力量，跟學術研究也沒有交集。從體裁、篇幅，以及大部分文獻的敘事內容看，馬共／左翼陣營尚停留在「敘述」而非「論述」的階段，他們都太過著眼於記錄過程、描寫細節、分辨是非、咬定立場、爭奪正統，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彼此質問、要求交待、相互攻訐。每個陣營乃至於每個個人都在各自的立場和認識上，檢視自己的歷史傷痛，以自我為中心，沉溺在己方／個人的記憶中而看不見其他人，甚至不知有其他人存在。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僅能以「小歷史」的格局出現。不過有趣的是，馬共／左翼並不認同「小歷史」敘事。²³

在「大歷史」的框架和要求下，馬共作為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可能性被壓縮甚至被排除了。當然，這個問題不單單發生在馬共方面，絕大多數與馬共相關的學術研究也面對同樣的問題。長期以來，馬共的內部論述以及外界的學術研究均以政治史為主流，可政治史本身非但沒有辦法應付實際狀況的複雜面貌，而且還排擠了其他歷史主體（如女性、基層／地下成員、一般戰士、

23 我曾在一場公眾座談會中指「大歷史」的框架忽略差異，有所不能涵蓋，並提出馬共作為性別史的可能性。這個觀點隨即引起與會者的質疑，有人認為當前馬共／左派歷史尚未得到很好的總結，採用「小歷史」的研究方法會危害它的代表性，有礙於正確地認識歷史；也有人認為集體和個別形象不能混淆，只有「大歷史」才能說明人民參與革命的集體意志，支離破碎的「小歷史」呈現不出整體，只能做補充。相關報導見：周澤南（2008年4月27日）〈新村村民主動塑造歷史〉，《當今大馬》，<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82003>。

民運、群眾等)和主題(如性別實踐、區域差異、社會生活、庶民記憶、森林作戰、飲食與求生技術等)的介入，而這些主體和課題恰恰是組合一幅馬共歷史拼圖的必要條件。

馬共／左翼的論述困境，以及令他們不能在論述上著眼於微的「大歷史」期待，正是導致黨史難產的原因。偏偏，馬共大多數的文牘累積卻在在說明了他們還處於形而下的「敘述」層次。他們對此焦慮不已卻一籌莫展，故而對歷史學者寄予厚望，頻頻提出總結這段歷史的呼籲，表示馬共／左翼文獻的彙編和出版，乃為學者鋪墊，期盼歷史能為他們走過的足跡做出公允的評論。然而，馬共／左翼其實還沒有準備好開誠面對歷史，因為他們對歷史學者的期望並不是無條件開放的。相反的，他們各自有自己的框架，不接受「別人」的、不同調的結論。然而左派本身並沒有「自己」的共識，因為他們根本不是一個團結的整體。

老左不死，只是凋零。假使馬共／左翼不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令這個情況持續下去，拖延愈久，恐怕愈不利於他們為自己在這場反殖建國鬥爭中爭取到應有的歷史位置和應得的歷史結論。